

(上接 a18 版)



1982年,龙飞虎孟瑜夫妇与儿孙的全家福,二排右一为长女龙铮



龙飞虎(左)、孟瑜(右)看望邓颖超(中)

力劝周恩来勿在小馆吃不洁食物 多次截获装有子弹的恐吓信

龙铮告诉记者,父亲在回忆录里多次写到周恩来为节省革命经费,而节衣缩食的生活点滴。在重庆时,周恩来的生活非常艰苦,他和同志们一样,每天只吃5角1分钱的伙食。但他却强撑着身体,忙得每天只睡两三个小时。看着过度疲劳,日渐消瘦的周恩来,给他做保卫工作的同志们都很焦躁难受,悄悄地通过了一项决议,给他餐桌上加了1个炒榨菜。为这,周恩来大为不满,带着责备的口吻说,“同志,不要忘记,我们现在正是困难当头,解放区还在吃窝窝头呢……”于是,保卫人员不得不将这项决议撤销。

龙飞虎另在回忆录里叙述,周恩来有时开会赶不及回来吃饭,就在街边小馆随便应付一下肚子。对此,保卫人员不同意他这种做法,小店是便宜一些,但是很不卫生,如果得了病,影响了工作,岂不是为小失大。周恩来却摆摆手称他只拣清洁干净的菜吃。另外,在随行保卫人员看来,国民党特务虽不敢公开逮捕,杀害办事处人员,但也会采取半路绑架的办法来袭击他们,而街边小馆治安隐患很大,随时会面临被偷袭的风险。所以,最终通过党小组会向周恩来提意见,邓颖超当面支持龙飞虎的观点,周恩来这才接受不去街边小馆就餐的意见。

值得一提的是,皖南事变后,在重庆出版的中共南方局机关报《新华日报》驳

斥敌人的恶语谎言,更成了舆论战斗的先锋。对此,敌人将它视为眼中钉,采用殴打、拘留留童,捣毁《新华日报》营业部门窗,借故搜查扣留报纸等各种卑劣手段。周恩来见此与董必武亲自向国民党当局进行抗议和交涉,敌人的疯狂迫害行为才收敛了一些。而在这之后,龙飞虎却截获了敌人送来的一份恐吓信,里面装着一发手枪子弹,叫嚣着让共产党把军队交出来,另威胁他们不准再在重庆活动。

重庆较场口血案中,在台上演讲的李公朴、施复亮、马寅初等民主人士遭到国民党特务的殴打,郭沫若也被打伤,另有60名劳动协会职工亦被打伤。在如此混乱危急的情况下,周恩来和廖承志等同志赶来,探望伤员,制止特务的卑劣行径。事后,龙飞虎再一次收到装有两颗子弹的恐吓信。只见信上写着“……如果你向蒋主席报告星期日早晨群众大会被捣毁的事,请你先看看这两颗子弹……”对此,周恩来却很坦然,幽默地说,“他们既然送来了,我们就不客气地收下吧!”

“在重庆那段风雨如晦、白色恐怖的日子里,我父亲龙飞虎也与廖承志、乔冠华、章文晋等同志一起在周公馆和红岩办事处共事很多年,成为了密不可分、牢固友谊的战友。就在新中国成立后,父亲每次从福州来北京开会,几乎都要与他们见面叙旧。”龙铮向记者晚记者说道。



1947年3月18日,毛泽东(右)撤出延安时,在吉普车上与行政秘书龙飞虎(左)合影

为防敌特向毛主席投毒亲自尝菜 敌机轰炸延安窑洞用机枪朝上打

1945年8月,日本帝国主义宣布无条件投降。为消除内战,实现和平,毛泽东亲自到重庆和国民党谈判。据龙铮介绍,毛主席在重庆谈判期间,保卫工作由龙飞虎负责。当时毛主席被安排住在重庆林园二号楼,龙飞虎和秘书陈龙对住房进行了仔细查看。头天夜里,龙飞虎躺在沙发上假寐,耳朵却在捕捉可疑的声音。半夜时分,一阵杂乱的脚步声由远而近,原来是宪兵巡逻到楼前。龙飞虎装着打鼾,双手握着上膛的驳壳枪。不一会儿宪兵渐渐走远,龙飞虎才松了口气。这夜,龙飞虎没合眼。清晨,毛主席在院子散步,龙飞虎和陈龙在相距十多步的后边跟随。毛主席在林园仅住了两个夜晚后,移居到红岩村。

不久,龙飞虎通过情报得知,国民党特务中有人扬言,愿以自身性命换毛主席一死。此情报引起了周恩来的高度重视,他通过公开方式向国民党当局提出警告,并强化了警卫工作。毛主席住在红岩村比在林园安全得多,可龙飞虎没有放松警惕,反而加强了保卫工作。除几个贴身警卫时刻不离毛主席外,红岩村的干部全参加站岗放哨,还采取了应急措施。

毛主席谈判之余常要会见民主人士,有时还要在酒楼饭馆宴请社会各界朋友。怎样防止敌特投毒暗害,保证饮食安全成了龙飞虎面临的难题。周恩来、陈龙曾与龙飞虎分析了特务几种破坏手段:暗杀、投毒、制造车祸

等。周恩来提醒龙飞虎,在这些方面要特别警惕。龙飞虎精心安排,一个细节都不漏。他通过地下党组织对进餐的饭馆作了安排,派出警卫人员监视厨房,从进菜、配料、烹调、出锅都亲自过目,所有饭菜自己尝一尝才上桌,保证了毛主席和客人的饮食安全。

1946年,龙飞虎由南京中共代表团返回延安后,便成了毛主席的行政秘书。1947年,蒋介石派胡宗南部轰炸延安。龙飞虎根据周恩来的指示,请毛主席搬到了杨家岭防空洞,此后又搬到王家坪的桃林。当时在毛主席周围负责警卫工作的,有一个内卫排和一个外卫连。那些天,敌人不分白昼地持续轰炸,龙飞虎和警卫兵们看到敌机飞过来,就用机枪朝上打,有时机枪打中敌人丢在空中的燃烧弹,烧得满天是火。敌机虽然不敢俯冲,可仍拼命地投炸弹、燃烧弹,对此,警卫兵们毫不畏惧,照常坚守自己的岗位。

在转战陕北刚开始的时候,毛主席和龙飞虎同坐一辆车,龙飞虎因两夜未睡,在车上打起了瞌睡,车子颠簸,龙飞虎差点掉下去,毛泽东一把拉住他:“老虎,当心点,要滚到车底下去了!”迷迷糊糊当中的他,听到毛主席、周恩来的哈哈大笑,这才清醒过来,拍了一下脑袋,暗暗责备自己,“怎么这样好睡!党再三叮嘱我要好好保卫毛主席的,现在倒是主席照料起我来了。”

龙铮成了西花厅的开心果 父亲表敬意两只樟木箱被“无情”退回

“1948年济南战役胜利后,时任济南市电力局人事科长的我母亲孟瑜带着我和哥哥龙桂辉随军进入济南,恰巧康克清妈妈也到了济南。她见此情况,提出把孩子交给她代管,让我母亲安心地随部队工作。就这样,我和哥哥被康妈妈带到北京,在她家住了三年后,被邓颖超妈妈接到了西花厅,一直住到我大学毕业,走上工作岗位后才离开了西花厅。”龙铮回忆道。

龙铮说,周恩来夫妇曾对她说,“你就是我们的半个女儿,为什么是半个,因为你爸爸、妈妈还在。姓名就不要改了,那不过是个符号。”龙铮表示,在开始,她始终不懂“总理”是什么官,也从来没有将周恩来和邓颖超当成“官”来对待,只是将他们当成自己十分依赖的慈祥的长辈。周恩来伯伯将小菜地里的西红柿摘来给她吃,邓妈妈常常抽空给她讲革命故事,有时还帮她辅导功课。而她有哭

有笑的,成了西花厅的开心果。

为了感谢周总理夫妇悉心照料他女儿,1960年,时任福州军区后勤部长的龙飞虎,曾做了两只樟木箱托人带到北京,交给周总理办公室主任董小鹏代为转交。尽管周恩来有不准办公室接受任何人礼品的严格规定,但考虑到父亲是跟随总理多年的同志,董小鹏也就收下了。然而报告此事后,董小鹏受到了周恩来的严厉批评,并坚持要其将两只木箱退回。这样两只樟木箱又托运回了福州。

“当时邓妈妈对我父亲说,许多国际友人送给总理的礼物,都分类登记,全部上交公家,并以此要求我父亲以后不要再送东西。而在我父亲眼里,周恩来是他的导师、领袖、上级和兄长,他对周恩来充满了崇敬之情。随着时间的沉淀,这份情意也越加真醇。”龙铮如此告诉记者。

文/记者 张恩杰
(老照片由张恩杰翻拍)